

國學小叢書

中國語言學研究

Karlǵren 著
賀昌羣 譯





原著者 Karligen
譯述者 賀昌羣
主編者 王雲五

國學叢書

中國語言學研究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初版

國學
小叢書
中國語言學開工一

(二二七)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原 著 者	Bernhard Karlgren
譯 述 者	賀 昌 羣
主 編 兼 人	王 雲 五
發 行 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印 刷 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 行 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中國語言學研究

序

此高本漢君在挪威人類文化比較研究學會之講稿，以一九二六年印於 Oslo。自流入中土後，以余所知，以之逐譯爲國語者，蓋有二本。一爲潘尊行先生所譯，用文語；一爲賀昌羣先生所譯，用口語，卽此本也。兩先生皆余摯友，譯事未竟之前，余又皆嘗先得而快讀之。讀前者時方寓廣州，余與尊行先生共事某校，校有文史學研究所，余爲執編纂之役。時方印期報，乃請於尊行先生，先以第一篇刊入，未幾而所中又擬出東方言語學叢書，乃中止續刊，留爲單行之用。顧爲議甫定，而人事搶攘，二人者皆離廣州，事遂中輟。讀此譯時方寓津門，余與昌羣先生亦適共事，其本則第一次未禁以

前之本也。蓋此二譯，其明晰條暢，足以傳世同，而其紆迴艱阻，不能即與世人相見亦同。今此譯於灰燼之餘，幸能補綴，更歷三載，卒底於成，而余復以昌羣先生之厚意，得綴一言於簡末，亦不可謂非厚幸矣。

高君此稿，雖爲比較通俗之作，然一切皆本於其自身多年精邃之研究，故言之自親切而扼要，此固爲吾人所深佩者。然其中亦不能謂全無可商之點。其最甚者，莫如對於文字方面之意見。高君對於我族文字之認識，因已勝於已往 J. Edkins, L. Weiger 諸人，然終不如其對於語音之瑩澈。如第五篇中，高君對於語言之比較，深致其懷疑與鄭重，而以爲幸有非標音之古文，使吾人得以窺見其含義之推衍；層次既明，然後得施之於比較，同時更示吾人以‘希’字之一例。此說驟視之若無可難，更深求之，則知高君固猶未達一間也。語言比較之當鄭重，高君除本書而外，‘Tibetan and Chinese’之發端，又嘗言之，吾人於此本無異議，可以勿論。至於憑藉文字，推求語原，在原則上自亦可以接受。然高君須知漢字之真相，並不如其想像中之簡單而明顯，自甲骨刻辭以至說文所錄，皆高君所寶之古文也，而其性質即已繁

復，有最古之Pictographs，有較晚之Ideographs，更有二者與Phonographs之合體，其遞嬗遞衍之跡，已有先難爲言者。如甲文𠂔多从𠂔，非聲符也，其後乃譌變而爲𠂔聲；行必作𠂔，非合體也，其後乃譌變而爲𠂔。此其所以致變之由來既未明，則語義之層序即難索。而甲骨刻辭之在今日，其明白可切者又極有限。彼沾沾自矜爲論定者，固皆去事實千萬里也。說文雖盡人所習，而二徐傳本，既有異同，各家增損，尤極錯雜，往往一單位之出入，所關於語源之解釋者至鉅，而言之多未爲定論。高君往歲爲‘Analytic Dictionary’於，聲意兩者之間，亦往往以己意勘定，此其糾紛未決之象，當能憶之。至如‘臚’之重文有‘膚’，‘自’之孳文爲‘鼻’，若斯之類，往昔學人所白首窮究而不得其解者，亦豈能更以陳法求之。故知語源之探明，雖在乎文字；而文字之探明，先待乎他術。其術爲何，曰，卽在於以同族語言相比勘是也。

試卽以上述二文爲例：‘臚’‘膚’二字在中古音爲liwo, p̃iu，此以舊日音韻訓詁學之眼光施之，固無術得以通解。然若一檢藏語Skin之讀plags，則此兩單

位之成立，正爲兩紐離散後之現象，可以立白。‘自’鼻二字在中古音爲 dz'i, b'ji, 固亦過於奇觚，然若知苗語‘鼻’之讀 pl-（依烏居龍藏所記）而從‘自’得聲者尙有韻 lai, 則 d'z- 爲後來之訛變，而‘鼻’之所以別加鼻聲，亦復可以立白（參閱作者字喃之組織與漢字之關係一文）。凡斯之類，正以見說文確爲瓊寶，決非今之但知輪廓者所可任意竄易。且說文果有疑似，亦必以比較方法，始得正之。如靄，从雨，晶象回轉形。嚴可均從韻會所引小徐，以爲當作晶聲。王筠因之，謂靄从晶聲，亦裘从求聲之比，說最明通。蓋靄本象形，已具雷音。其後變易，則增雨之意符。此以 Gni Lolo 所用音字 𐄌 值爲 lea 證之，可以知其不悞。（Gni Lolo 所用音字，確爲古漢文之借。如 𐄌 gni 之爲女，𐄌 la 之爲旅等等，皆絕無可疑，余別有言文之。）更以他語證之，則藏語讀雷爲 hɿrug，暹語爲 fa lán, shan語爲 pha lán, 种家子爲 pia rai, （此依 D'ollone 所記，我國舊紀錄所謂‘巴來’，正與相合。）雖語姿各有小殊，而其有 p-l- 兩紐則一。最初 𐄌 之一符，亦必代表 *pl- 之複值，殆無可疑。此證既成，則‘果’之構成，亦得而說。說文言从

木，象果形在木之上，此不與刻辭相合，世多疑之，今證之藏語，則 fruit 爲 hbras，是知其上之田，亦正 *bl- 之聲符。其後乃爲 bl > k' 之衍。（此在安南語中有同例，如 plau > k'au，參閱馬伯樂 Étude sur la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故从果者尚有裸 luo，雖訛異已甚，而痕跡未盡泯也。

準上所述，可知語源之研討，固賴於文字之倖存；而文字之推求，亦賴於語言之互證。此兩者往往爲一事之兩面，而非後先之兩事。高君雖精通漢籍，而遠居西土，其於史料之取資，本不如我人之便，稍有隔膜，亦無足怪。又其第一篇中，稱漢語之音讀與形式，在文字未具以前，實已極簡，故漢字亦不能不有一種特性以應之。此亦未必盡然。甲金文中，往往有若干加綴之符號。甲文如𠂔有𠂔，𠂔有𠂔，金文如𠂔有𠂔，𠂔有𠂔，皆甚似 prefix p- 或 m- 之痕跡。（甲文之八，余向疑爲冠飾，實悞。附正於此。）其他可舉者尙夥，疏通證明，雖俟異日，必斷言其絕無變化，則似亦失之過早也。

上來所陳，以爲篇幅所限，皆僅及其辜較。惟區

區之愚，竊以爲關於古文字語言研討之徑路者甚鉅，故先表而出之，以乞高君及昌羣先生之教。其他方面，尙有足以商討者，亦不復出也。

聞 宥

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序於平四成府之寓廬

譯者贅言

瑞典高本漢先生(Bernhard Karlgren)在我國古音學上的貢獻，學術界早有定評。高氏的結論，我國學者不少接受的，在歐洲則惟馬伯樂氏 (H. Maspero) 常與之處於對立的地位。高氏謂上古中國語有語尾變化，馬氏反之，高氏分別古音的韻類，馬氏亦多所商榷。數年前高氏據敦煌本切韻殘卷而考證第六世紀之音，馬氏亦嘗爲文駁論，當時我國學者對於古音亦發生一場論戰，中國語言音韻者之廢棄傳統的反切法而採用系統的羅馬字音標法，即自此始。現在國內幾個明敏的語言音韻學者之所以能表現相當的成就，未始非有借於高氏之力。最近高氏又著詩經研究 (載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 Antiquities, Stockholm, No. 4) 及老子中之詩韻 (載 Göteborgs Högskolas Årsskrift)，此二文爲他考訂中國上古音讀的重要結論。

高氏的單行本著作，據我所知，譯成中文者，連本

書共有三種，論文有四五種。有兩位譯者喜改動高氏的標音符號，這固然亦屬譯者的責任，但我以為未得著者的同意時，其正確否還是不改爲是，關於這層，本書全依高氏的原文，惟明知其錯誤或刊誤者，如原書頁八四第二節十二行之福建當改廣東，頁一一二之兩‘笛’字當改爲‘甬’，頁一三二倒數第五行之 Pek.A.J.當改J.爲Ch.，此外書中間有一二處爲手民誤植，譯者便逕行改正了。

本書原名 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 (1926)，書名久經思索，總難譯妥，不得已乃改易今名。

此書之譯在民國十七年，至今五更寒暑，中間經‘一二八’之難，商務書館總廠被敵焚燬，而本書譯稿及已將完工的紙板亦同罹劫。今年九月始整理殘篇，又承王雲五先生的盛意，再行重印，此譯本始得重見於世。

賀昌羣二十二，十二，十五。於北平北溝。

中國語言學研究

引 言

挪威京城的學術界想做一番對於人文研究的大事業，於是創設了一個‘人類文化比較研究所’，這是適應歷史的科學精神之一種最高的計劃。初擬限於很狹窄的題目之專研，文獻的考證及國學的各門學問；但人文的研究，開始便得很順利的進行，因為視野擴大了，新學問的領域亦開放了，印度的思想與語言亦成學者鑽研的交點了，從前研究的各種學問已都起了關係了。這些趨向都足以開展經驗的範圍，而投照以比較研究法之光，如高撐火炬奔馳於近代一切人文研究的畛域之中，無論其方法為歷史學派的或語言學派的。因此，這研究一方面更探究到美洲的古代文明，及其人種與現今的各

種語言；在另一方面，則注意於亞洲古今五光十色的文明及各種語文的歧異。譬如說，北半球的歷史家對於日本的‘海盜時代’（Viking Age）而引起一種相資爲鑑的趣味，我們瑞典的大史家饒爾納（Harald Hjärne）即曾對日本與瑞典的歷史下過一番淵深敏銳的功夫。對於哲學家，如中國的思想，其凝聚性雖不能與印度思想等量等觀，但固深饒趣味。對於語言學者，那東方的廣大的語言區域，暗流着豐沛的大動脈，在這區域中已經有人工作過了，但結果還須重新考驗，敢說這方面對於幫助決定語言進化的普通規律，必大有可爲。

這擴大的趨向和比較的研究，是挪威研究所的基本企圖，雖然研究所之成立爲時甚短，但很願在這里貢獻一門東亞的學問，雖說較爲幼稚，但對於北方（指斯干底拉維亞半島——譯者）的各大學幾乎還是陌生的。我很欣幸，承你們的延請，教我告訴你們一些關於在這門學問中所研究得的成績。

在這研究所中的研究員，應不可疎忽這個比較研究的觀念。那末，要敘述一些關於中國學術（Sinology）的重要的事項，求其與他種研究之同和異（Parallels and

Contrasts) 的現象，而或許能於其中得到啟示，這便是我的工作。我個人的研究側重於中國歷史，尤其是她的聲韻學和語音的演變，真是一片沃野，這便是引誘我選擇如本書的題目來研究之故。語音學者^①可以在這片沃野中獲得豐富的收成，我們在印歐 (Indo-European) 語系的現象中亦可得到很正確的啟示——如在某種情況之下的上腭音，喉音及同音與分化音，音之通轉及僕音之消失，與夫呼出的音樂的重音——總之，假如我們要試行從事於建設一普遍的進化的語音學，這些都是極有價值的對比。此外自然還有中國語發展過程中其自身所具有的各種特殊情形，及通常現象裏的種種疑難，這些也是很可資為借鏡的。

①我將在此聲明，本書下文所用——依歐洲大陸的習慣——術語，如語音學，語音學的，語音學者 (linguistics, linguistic, linguist) 與語言研究之義同，包括聲韻學 (Phonology)，字形學 (Morphology)，句法 (Syntax)，語義進化論 (Semasiology) 等之敘述的，歷史的，比較的研究。而語言學，語言學的，語言學者 (philology, philological, philologist) 一詞，則為廣義的語言研究，蓋指語言為文獻之傳述，即校勘學，訓詁學等。這層在英語中是沒有含混的。

但我知道這樣一個企圖，尤其關於純粹語音學，必不能滿意的實現這個叢書（按即人文研究所出版的叢書，高氏此書即該叢書之一種——譯者）的目的，換言之，即不能給與普通文化學者之於中國學術與其他各種研究參互比較而得其異同；因此本書略略避去其專門性。所幸我亦無須穿著語音學的外衣，我是披著歷史學者或文獻學者的衫褂，以求達到這個最通俗的目的。因為在中國，事實是如此，那語言的本質和它的特性以及文字的基本組織，都注定了，有許多已十分異於古代中國的文明，可是也有新的仍根深蒂固地從出於古昔的。即以語音而論，因其語言本質之變易無常，故於中國古史的研究，在種種關係上，對於研究西方學問的學者，就完全失去其參互比較的功用。有許多是相類相同而且很饒趣味，但絕不相同而適相反的事卻也不少，再泛言之，就是我們須得採用別的完全不同的方法，這些趨異的情形，都是中國語的特性有以致之，可令我們長思的，應詳為敘述，因此我用了本書的標題，所論是：

● 中國古代語的特性是什麼構成的，那構成這特性的

東西，是她的文獻嗎？對於這種語言學上的問題和治語言學的方法是什麼，這問題和方法要怎樣才可有辦法去解決？現在語言學者對於解除這些特性的困難，和近來改革語言文字的各種問題是怎樣？

於是我的論述便分爲三個段落。第一很扼要的論述中國語言文字的性質——祇是一個概括的描述，所以其中有許多是曾爲各家論列而久已周知的事^①，但間亦參着我自己的觀點——這樣的描述是必須的，以便我們下文才好自由發揮。然後我試行提出一個治中國語音學的路徑和方法的意見。關於這層，我將貢獻我從前研究所得的結論，簡略敘說一下，其中有些提示在我的意思還須繼續研究。最後，始進而涉及純粹的事實範圍，略論現時領袖學者所困心衡慮的問題，不單是中國，且將兼及其文化殖民地的日本，如何才可以把她現代的語言文字擺脫過去所受中國的束縛，蓋日本的語文仍然像櫥裏陳列着的一架蜀體啊。

①參閱高本漢中國語與中國文 (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 Oxford, 1923. 按此書張世祿君已譯出，商務印書館出版。)